



# 史默鲁火山灾难牵动人心

■ 本报评论员：余凡

今年12月4日下午三时许，全爪哇岛海拔最高的史默鲁(Semeru)火山喷发炽热灰沙、熔岩岩浆，造成不少死伤，千余村民紧急转移，不少民房及公共设施遭到损毁。其实，早在1月16日，史默鲁火山就曾喷发过，泄岩浆；不过，当时并没有造成多大损失。

但这次的火山灾情相当严重，东爪哇省南海漳县(Lumajang)数个乡镇都被波及，尤其是史默鲁火山东南方向的多个村庄。佐科总统5日紧急下令，指示相关部门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救助史默鲁火山的灾情，迅速供给生活物资，寻找失踪者，并妥善安置灾区民众。

《罗盘网》(KOMPAS.com)于6日报道，巴扎查兰大学(UNPAD)地质工程系的苏腊沙纳(Nana Sulaksana)教

授认为：“4日的爆发并非突然，因为之前已有数次岩浆作用(magmatisme)。然而前天火山活动加剧时，却恰逢暴雨连绵的恶劣天气。”“如果没有降雨，火山喷发物不会形成岩浆。而今天大雨倾盆，使山口堆积的大量物质冲向山下的河谷、低地。”

作为地貌学(Geomorfologi)的专家，他分析史默鲁火山特有的活动规律，在发生激烈的喷发后，将平息较长一段时间。印尼地质及火山学专家已绘制了发生火山灾难时的预测图，哪里是可能受灾的居民点及河谷，哪里是紧急疏散时的安全途径，及邻近适于避难的场所。“对照这次史默鲁火山喷发的实况，与专家的预测图有90%的契合。”政府也配备了缓解协议(protocol mitigasi)系统，能在火山爆发前一小时，就向当地民众发出警报。

《国际日报》于7日报道，南海漳(Lumajang)地方灾害管理局发出的报告，受史默鲁火山爆发影响的房屋数量为2970座，还有桥梁、教育设施和教堂受到破坏。“遭受最大损害的公共设施是Gladak Perak大桥坍塌。此大桥是南海漳与玛朗的主要通道。”

《罗盘网》7日描述灾区的景象，南海漳县婆诺基沃区(Pronojiwo)的苏比务朗村(Supit Urang)某家民居沾满灰尘的玻璃窗上，有人用手指写下“上帝护佑我们吧”的祈祷。在另一家的玻璃窗，则写下“再见，朋友”，还画上一颗“爱心”，让读者感慨万千。

村民玻尼迪(Ponidi)说，“我亲眼看着火山灰袭来，起初还不太大。家人已经先转移了，我留下来观察，但准备好电单车可以快速逃避。”另一位中年村民务米(Umi Kulsum)说：“下午3

点，一切如常，村民并不惊慌。当热灰洒落时，人们才跑进屋里，四周变得一片漆黑。”他被火山灰呛得难以呼吸，电灯却暗了，村民只好又跑出来寻找避难所。

有幸逃生的村民叙述，对史默鲁火山的灾难还心有余悸，目前宁愿呆在避难所，设备简单些也无所谓，能睡个安稳觉就好了。并描绘被泥浆淹没、毁坏民居，栏圈里不能逃生、横七竖八的家畜。还有孝顺的年轻妇女卢米妮(Rumini)，她的丈夫已先带着两个小孩转移，她因不忍放下腿脚不便的老母亲而自己逃命，结果与母亲相拥被埋在厨房的灰泥里。

灾后到来的救援队马上手收集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其中包括来自珍伯尔(Jember)县的昆都尔(Guntur Handoko)和巴贡(Bagong)。他们俩在史默鲁火山爆发当天照常进行采

集沙石的工作，地方救灾署(BPBD)的官员说：“他们的卡车进入Sumberwuluh村的采砂场，‘卡车已被寻获，车牌对照无误，但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愿失联者能平安回家。”

从救灾署、新闻记者及个人传发的简短视频中，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灾区当时火山灰掉在身上的灼热，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硫磺味，逃避灾难时惶恐而急促的脚步，警示而长鸣的卡车汽笛；绿野景区洒满荒凉的灰沙，原本深邃的采砂矿坑转眼竟被回填了一大半。

中国《环球时报》12月8日报道，“塞梅鲁火山4日下午开始喷出火山灰和烟雾，喷出物不断向东南方向飘散，覆盖火山东南坡上多个乡村。”“目前，救援队在火山灰中艰难前行并挖掘遇难者遗体。”并连续数日刊登救灾照片，传达了国际的人道关怀。

除了主流媒体及电视台的图片和视频，社交网络上也有个人拍摄的短视频，但良莠不齐。少数流传的灾区现况，不加“马赛克”地拍摄死者的惨状，期间还听到隐约的议论和“窃窃笑声”。发送视频者的不专业、不道德，引发了很多国内网民的不满和谴责。

截至12月8日，已有34人遇难，16人失踪，住院治疗的伤者69人，损毁的公共设施31处，3千余只牲畜死亡。有2004位灾民被安置在19处由学校建筑物为主的避难所。

佐科总统于7日抵达灾区慰问时宣称：“我以国家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名义，谨向东爪哇省史默鲁火山爆发的死难者表达深刻的哀悼。”并指示密切关注灾民的健康、饮食及情绪等问题。相信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支援下，史默鲁火山的灾情很快就会被克服。

■ 雅加达：游子

## (七) 印尼对抗马来西亚的起因

我进了“南中”第二年，印尼抗马闹得轰轰烈烈，山口洋等地区也经常举行军事演习。当时让我最刺激的是夜间的军事演习，深夜中突然响起长长的警报，沉寂过后，就是枪声炮弹声，当时我们很好奇，伙伏在家里从木板缝中偷视外面的“战火”，一串串火红的炮弹从四面八方地面升起，交叉在夜空中，哥哥说，这是地面炮兵射击敌机的炮弹，突然！“噱……”一排子弹声从屋顶飞过……哇！好险！不久，我们的学校“南中”顶层还建当地军部借去辟为防空哨站，驻守着军人还架上了机关枪，是说怕马来西亚飞机侵犯印尼领空，从此母校被蒙上了战争的阴影，一向简单头脑的我们，也无意中沾染了政治。

其实，印马对抗是当时国际冷战背景下美国与苏联在东南亚势力的角力。1963年，当时在英帝国策划下，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企图将马来半岛、新加坡、沙巴、沙捞越、汶莱建立成英帝国的傀儡国“马来亚联邦”，遭到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最先汶莱的阿扎利发动武装“起义”，并成立了“北加里曼丹国”，还建立了“北加人民军”，地区包括汶莱、沙捞越和沙巴。但这次汶莱的“叛变”很快被英军平定，残余的“北加人民军”逃进与

印尼边境的森林里。而马来西亚却指责印尼在幕后协助汶莱的“叛变”，让印马两国的关系恶化起来。

1963年9月17日印马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当时亲共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发起了“粉碎马来西亚”口号的“两项人民命令”，燃起了印尼人民的抗马火焰。据说，到1963年年底，有数千的沙捞越青年包括山口洋、孟加彭县、三发县、坤甸县一带的志愿者在印尼接受军训，支援北加人民军。而当当地人的参与，却成了后来苏哈多政府镇压、迫害西加华人的藉口！

“南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转眼结束了。1965年6月我中学毕业，完成了九年的华文教育，当时我才16岁。

还记得自己毕业前夕，我们这班十几位男同学还约去照相馆照相；而甲乙两班同学还乘上两辆大卡车到山口洋美丽的海滩长沙坝旅行呢。沿途中，大家嘻嘻哈哈，也忘了大家即将劳燕纷飞、各散东西的情愁！

中学毕业后在家的头几天，倒觉得蛮轻松的，不必清早往学校赶，不必每晚要温习功课……但整天无所事事真无聊，好多同学都去了雅加达升学了。想起以前与附近的几位同学一起上学，到学校一起玩耍、聊天、打球、嘻嘻哈哈的每一幕有多么的让人留恋，如今已一去不复返。目送已同窗三年的许多同学到雅加达入学，我除了依依不舍外也

## 光阴荏苒 岁月留痕 ——身居故乡25载回忆录

有几分羡慕，但从埋怨自己家境不如人，还希望尽早踏入“社会大学”，找份工作做，好让父母能过个好日子。我明白，父亲失业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也都六十出头的人了，也该退休了，自己能读完中学已经不错啦。

当时对自己今后的出路也感到十分彷徨，几个哥哥中学毕业后就被镇里的教委会派到各乡村中华小学去执教，每月的薪水却只够养活自己，反而三哥四哥他们当小贩卖冰水好，工作虽辛苦，但赚得钱却足够养活几口人。一想到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难道毕业出来就只能像哥哥们当小贩卖冰水？茫然的前途，让我思来想去觉得好苦恼。

### (八)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

很快的一星期又过去了。一天，母亲将我叫到跟前道：“孩子，你大姐说，要你去大姐夫的弄弄店帮忙，你觉得如何？”当时，大姐夫已从“假狮”调到山口洋小学当教员，也许当时教员薪水低，孩子又添了几个，入不敷出，就辞了教书的工作，到郊区开了间哇弄店。

“大姐夫那小店？姐夫不是有个帮手吗？还需要人？”我有些不置信地问。

“你大姐已经跟你姐夫说

好了，明天就去看吧！学学做生意也好。”母亲瞪着我道。

我耸耸肩，无可奈何地回答说：“那……那我明天就去试试吧！”

大姐夫的哇弄店其实是间小杂货店，座落在郊区的一个马来由族区，也有少数的马都拉人居住，他们中以工人、农民、小贩、小公务员居多；所以哇弄店所经营的也只是柴米油盐日常必需品，生意也不见得怎么好。

第二天太阳刚升起，我就抄小路步行到了大姐夫的哇弄店，姐夫的伙计正打开店门。

“哦！这么早。”大姐夫像刚起床的样子见到我打声招呼。

“姐夫，每天都这么早开店吗？”

“平常早上有一阵子生意做，我们不早开门，顾客会跑到别处去的。”姐夫回答说。

果然，陆陆续续有人来买东西了。

看着他们忙着做生意，我想帮又帮不上手。自小就成长在华人区的我，说的都是客家话，在学校里学到的印尼文又有限，如今听他们吱吱呀呀的讲印尼语只听懂一知半解，只好傻傻地站在一旁观看。

好容易挨到黄昏，大姐夫

叫关天了，我正想告诉他明天不来了！可大姐夫早就看穿我心思似的，没等我先开口就笑道：“小弟呀！别心急，慢慢看慢慢学，过几天你就能学会了，多与他们会话，比在学校里学到的还管用！”

一时我不好意思再说做什么，决定明天再来看看，再不行，就拉倒！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也慢慢地掌握了许许多多印尼文的日常用语，更记住了各种各样的货物的印尼文名字与价钱，怎样秤米秤油打珠算，有时姐夫不在，伙计阿茂又去办货，我还独当一面也心不慌。

一天，姐夫突然说：“阿茂不干了，说要到外埠去工作，你今后就会较忙了。”

“哦……他不想做了？”这完全没一点预兆的消息让我心里好难受，自己来了不到三个月，想不到那替姐夫工作了多年的阿茂却不干了，是不是因自己的出现让他想走？一

间小哇弄店本来就不必雇用两个伙计嘛。可大姐夫却说：“想走的终究要走的，近来也可看出他没心做，强留也没用！”可我还是心里闷闷不乐，这些日子来，是他教了我许多做买卖的学问，看到我替他后辞职不干了吗？

自阿茂走后，我就替代了他的全部工作，每天关店后回到姐夫家吃了晚餐后还得到回店里过夜，独个儿看守店，姐夫担心晚上店里没人睡贼子会趁机来光顾。开始时我心里好委屈，十分不愿意。因店周围住家不多，近邻又没有华人住，后面是大片灌木丛，夜里四周静悄悄的伸掌不见五指，冷清的只听蝉儿鸣；更听说灌木丛里还有几座坟墓，虽不迷信这世上有鬼神但依然感到害怕，连着几夜都睡不安宁。

睡不着就看书嘛，就将自己紊乱的思绪沉浸于书本上的小说中……

(未完待续)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开国总统苏加诺像——李曼峰画

## 遭受怀疑的华人美术：1998年以前

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事物立刻成为负面标签，华人艺术家的一举一动都被怀疑在密谋不利于印尼的举措。十几年间，他们在秘密监控下生活。下述事件可以为证。

1974年，雅加达发生“黑色十二月”运动(Gerakan Desember Hitam)。伊斯玛伊·玛祖基艺术中心(Taman Ismail Marzuki, 简称TIM)举办了印尼绘画艺术双年展(Biennale Seni Lukis

Indonesia)。评审团评选出最终获奖作品后，受到大量年轻艺术家的抗议。被评审团评为最佳画作的作者分别是伊尔森(Irsam)、阿巴斯·阿里巴沙(Abas Alibasyah)、威达杰(Widajjat)、阿明·普拉伊诺(Aming Prayitno)和比洛斯(A. D. Piro)。抗议者认为，这个结果将成为印尼美术消亡的开端，因为获奖作品只是单纯地继承了印尼传统美术风格，他们希望美术能够结合人性价值，突出人类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现状。更准确地讲，年轻画家们希望美术作品能够承载更多当代元素。接着，抗议者向颁奖地点伊斯玛伊·玛祖基艺术中心剧场(Teater Arena TIM)寄去哀悼花圈，场面甚是轰动。

后来，战火蔓延至年轻艺术家学习上课的校园里。在日惹印尼美术学院(Sekolah Tinggi Seni Rupa Indonesia, 简称STSR)就读的五名大学生，哈索诺(F. X. Harsono)、穆尼·阿尔迪(B. Munni Ardi)、哈尔迪

## 华人美术的社会层面(5)

阿古斯·德尔玛万(AGUS DERMAWAN T)

(Hardi)、希迪·阿迪亚蒂(Siti Adiyati)和利斯·布尔沃诺(Ris Purwono)因此被审讯。审讯于1975年1月21日在STSR主楼(如今变成日惹博物馆,Jogja National Museum)三楼进行，华人艺术家哈尔索诺(Harsono)，原名胡鸿文(Oh Hong Boen)遭受最严酷的追问，审讯官反复针对他的家世问题，不断质问：“你是图谋摧毁印尼文化吗？你知不知道此事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Rath dkk, 2010)

审讯结束后，哈尔索诺和敢于发声的画家哈尔迪被学校勒令无限期休学，同时，另外三名学生也被勒令休学一段时间。后来，哈尔索诺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当代艺术家，他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的作品，表达了华族作为政治歧视的牺牲者的悲哀(详情参考本书《七十年代后

的华人艺术家》)。

然而，事情并没有收场。由于不认同校方的处罚，1975年3月，许多学生在日惹荷兰领事馆图书馆大楼(Karta Pustaka)举办了一场嘲讽模仿秀，主题为“努山达拉！努山达拉！”这场由哲学家迪克·哈尔多克(Dick Hartoko)主持开场的模仿秀，招来了新的嫌疑。人们认为这场模仿秀和黑色十二月运动一样，都是文化颠覆活动的一环，背后由华人不法分子操纵。这次活动甚至还被抓哇要马都拉第4防卫区司令(Panglima Komando Wilayah Pertahanan IV Jawa-Madura)威多多中将(Letjen Widodo)记录在案。后来，校园墙壁上还出现诽谤性涂鸦，写着：“开除阿古斯(Agus D.T.)！他是中国共产党员！”阿古斯是一名参与模仿秀的画家，最后也被勒令无限期退

学。阿古斯，又名陈庆和(Tan Khing Hoo)，他的确是华人，但并非共产党分子，准确来说，他根本不参与政治(Tribun 周报，1975年4月)。

不容置疑，长达三十年间，华人艺术家遭受歧视，被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末期，波兰华沙(Warsawa)成立了一家亚太太平洋美术馆，展出的成百上千件画作中，有皮露斯(A.D. Pirous)、苏旦多(T. Sutanto)、斯里哈迪·苏达尔索诺(Srihadi Sudarsono)、非得路斯·刘(Fidrus Lauw)、李俊才等名家的作品。当时，印尼记者、报社得知这个足以成为民族骄傲的博物馆后，纷纷发表相关报道。但是，这些报道只刊登印尼土著画家的名字，有意避免提及非得路斯·刘和李俊才等华人画家。

后来在一个展览会上，几位华人画家就这一情况提出疑问。《珍珠》周刊记者赖·里萨尔(Ray Rizal)承认，起初记者有登上华人画家姓名，但报社编辑为了“保持干净”，不

得不删掉。因为编辑受命于主编，而主编需面对来自新闻部(Kementerian Penerangan)的压力。此事也得到雅加达文化记者主席伊斯玛尔(Ismail)的承认。难道主编真的认为华人的名字“不干净”吗？无从得知。

此外，还有一事。1965年政治犯大赦数年后，十几位非政治华人画家相聚在雅加达特勒西亚教堂路(Jalan Gereja Theresia)文化馆(Balai Budaya)举办展览会。但展览会并不受欢迎，甚至有报纸讽刺其为“华侨银会”。这篇报道影响极大，不但国家情报统筹机构(Badan Koordinator Intelijen Negara, 简称Bakin, 现称国家情报机构 Badan Intelijen Negara, 简称BIN)进行监视，华人艺术家的社会活动也被怀疑是“左派画家复辟”前兆。当时，“左派”代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